

《聯合文學》

藍博洲◎著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 藍博洲／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藍博洲著．--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1〔民90〕

面：公分．--（聯合文叢；226）

ISBN 957-522-331-4（平裝）

1.臺灣-傳記-通俗作品

782.632

90007673

聯合文叢 226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作 者／藍博洲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戴榮芝

校對／呂佳真 張清志 藍博洲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1年8月 初版

定價／360元

copyright © 2001 by Lang Bo Chou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序】／陳映真 004

尋找台灣新劇運動的旗手宋非我 011

尋找劇作家簡國賢 073

揭開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生死之謎 115

【附錄】簡評藍博洲的調查報告／林書揚 153

放逐詩人雷石榆 157

從福馬林池撈起來的詩人藍明谷 237

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 333

【後記】 400

聯合文叢
226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 藍博洲／著



目次

【序】／陳映真 004

尋找台灣新劇運動的旗手宋非我 011

尋找劇作家簡國賢 073

揭開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生死之謎 115

【附錄】簡評藍博洲的調查報告／林書揚 153

放逐詩人雷石榆 157

從福馬林池撈起來的詩人藍明谷 237

尋訪吳濁流的文學原鄉 333

【後記】 400

序

陳映真

十多年來，一般的台灣文學論中，存在著很多沒有經過嚴格檢證的刻板論述。例如，說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國民黨政權代日帝統治台灣，於是日據時代養成的台灣知識分子和作家遭逢了噩運：語言的急速轉換，使台灣知識分子失語失聰，作家被迫退出文壇；台灣知識分子對祖國中國因國民黨惡政而幻滅，對中國的認同受到重挫。來台外省人趾高氣揚，在文化、文學上居支配地位、歧視台灣知識分子和作家。藍博洲的新書《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證明這些「刻板論說」的欺罔。

五十年的異族統治，最終剝奪了被殖民民族一定世代的母語，是無庸辯說的傷害。但光復後被權力禁絕的日語，究竟不是台灣知識分子自己的民族母語，而是異族統治者以暴力收奪母語基礎上強加的異族語。光復一年後禁用日語，固然給日帝下養成的知識分子一定程度的不便與苦惱，但也絕不應忽視當時具有高度中國意識的知識分子自覺、主動、奮力學習漢語白話的意志和實踐。作家呂赫若在日據時就耽讀類如《紅樓夢》、《浮生六記》和《駱駝祥子》，光復後

不久就投入著名台灣革命運動家蘇新領導的新聞報導工作，並且早在「二·二八事變」前夕，陸續發表了白話文寫成的四個短篇小說，深刻表現了對皇民主義辛辣的諷刺、和對於光復後劣政下兩岸同胞接觸時發生的陰暗的生活強烈的批判。同時代的蘇新、周青、吳克泰、林曙光、賴明弘等人當時漢語白話水平之高，超出我們的想像。

留日的年輕劇作家簡國賢起初也確實無法寫流暢的白話文，所以他戰後唯一的戲劇力作《壁》是先利用日語寫成，再逐句譯成中文，準備刊行的。但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簡國賢被白色恐怖殺害前在獄中與夫人理子通信時，簡國賢已能深刻、準確地用白話文表達他的熾熱的思想與深情。

簡國賢的《壁》雖以日語寫成，但演出時，是以優秀的台灣大眾語——閩南語文學家宋非我譯成的「台語」腳本排演的。三〇年代初，台灣的左翼文學運動圈進行了大眾文學中大眾語問題的爭論。其中有一派主張在台灣全面推廣白話文，使白話文成為大眾通用語，以白話文為宣傳、創作的語言。另一派人則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漢語白話與人民大眾日常生活勞動使用的大眾語——閩南語之間有一定距離，所以主張整理台灣的大眾語「台灣話文」來做為宣傳鼓動和文藝創作的語言。後來由於日本當局政策上禁絕漢語，這個爭論也就不了了之，沒有具體結果。

一九四六年，台灣第一位才華橫溢的大眾語講說和演劇藝術家宋非我，把簡國賢日語劇本《壁》「譯」成台灣大眾話，以漢語文完整表記為可以朗讀排演的劇本。做為光復初「台廣」的台語播音員，宋非我也寫了大量以漢字表記的方言廣播劇。宋非我也以台語寫了劇本《羅漢赴

會》、和諷刺時政的廣播故事《土地公遊台灣》。他和簡國賢成為光復當初台灣進步戲劇運動的重要推手。一九四八年，為躲避二二八事變後的鎮壓，宋非我脫逃東渡大陸，在新中國時期長期從事對台廣播，而留下大量的台語講誦文學作品。其中《墓窟窟》、《蓬萊仙島》和《月游淡水河》都是長篇力作，以台灣話（中國閩南系方言）大眾語從事長篇、有思想內容、又有藝術形象的文藝創作，實踐了三〇年代「台灣話文」的理想。光復後禁絕日語，不但沒有使宋非我噤啞，反而造就了中國閩南系方言大眾語文學家宋非我。

本書中另一位早折的文學家藍明谷，因為愛國主義，在日本戰敗前幾年經由日本奔赴大陸，在抗戰勝利前夕就以白話文發表了短篇《一個少女的死》。一九四六年回台以後，他陸續發表了流暢地評議時政的雜文和散文，文筆熟達，思想深刻。吳濁流也是以日語為主要創作語言的重要台灣作家，但他的古漢詩的素養與創作，在他同時代台灣作家中難出其右。

藍博洲的調查研究為我們說明：光復後由於禁絕日語，台灣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成了文盲、都得退出文壇之說大不足信。

其次，說到光復後台灣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對中國的幻滅和對於中國認同的挫折。

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和藍明谷，無不歷經了光復後國民黨在台統治的惡政，也無不經受了「二·二八事變」的衝擊。但是經受了這體驗和衝擊之後的這些人所做的選擇，不但看不到他們對於中國的幻滅與認同的挫折，正相反，他們，以及許多同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懷抱了新的希望，尋找到新的中國認同，從而投身於火熱的革命實踐。劇作家簡國賢不但在事變

後成為中共地下黨人，據藍博洲的調查，他甚至和台灣著名革命家張志忠共同領導十三份地方的根據地，並且在地下黨中央潰壞之後，負起了組織重建的大任。小說家呂赫若，以他為眾所欽佩的、多姿多采的才華與甚於小康的家世，他不但毅然潛行地下，甚至負起了籌辦印刷廠為地下機關、負責超乎想像之沉重的深山中的發報工作，孤獨地死於蛇吻。而藍明谷則在二月事變後不久參加地下黨，負責「基隆中學支部」的部分領導工作和地下報《光明報》的編輯。組織破壞後逃亡經年，藍明谷在一九五一年犧牲。

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和左翼文學運動有密切的關聯。三〇年代第一次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如上所述，是台灣大眾（人民）文學運動語文方針的爭論。戰後一九四七年迄一九四九年間一場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爭，也基本上是一場在台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內部的議論，討論了台灣文學的大眾性、文學的指導思想（即歷史唯物論）、新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台灣新文學的屬性，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等問題。而恰恰是在這同一時期中，宋非我脫逃投向革命的中國，簡國賢、呂赫若和藍明谷潛行地下，終至被殺。尤其是簡國賢、呂赫若、藍明谷三個作家，並不僅僅是對於進步和改造抱有思想與情感上的傾向性，而是自覺地投身到至極險惡、艱苦的革命實踐。這在台灣新文學史上，就絕不能只看成個別的、巧合與偶然的文學現象。

說光復後省內知識分子備受迫害，省外知識分子享有政治、文化特權，夥同權力壓迫本省知識分子，也經不起歷史的檢證。

藍博洲詳細報告了省外作家雷石榆被強制驅逐離台之始末。史料告訴我們，《新生報》「橋」

副刊主編歌雷、台大文藝青年孫達人、福建系作家姚勇來、鄭天宇等多人都被捕入獄。文藝理論家羅鐵鷹被迫逃亡離台。福建籍作家歐坦生被迫隱名改姓。本省作家除上述被殺害者，還有著名作家楊遠被捕下獄。在光復後苛烈政治的被害文學家中，絕無省內和省外的差別。

不僅如此，光復後在台灣包括省外和省內知識分子在內的知識界、文學界，甚至在慘痛的二·二八事變之後，一直存在著不分省籍，力求克服惡劣政治造成的民族裂痕，力爭民族團結、也力爭進步的公共領域。藍博洲對雷石榆事蹟的調查，說明了這事實。

早在一九三五年，負笈東京的雷石榆就和當時台灣進步文壇結緣，嗣後多次在台灣發表進步文學理論，策動台灣文學界的進步和發展，並與台灣文學界賴明弘、吳坤煌等人有親切交往。一九四六年來台之後，雷石榆參加言論工作，以關心台灣、「為台灣人民的民主與生存權利而陳詞說理」。二·二八事變之後，猶「在沉悶、徬徨和戰慄中，為鼓勵台灣作家奮勇前進」而參與了關於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爭，在引介和提高台灣進步文論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像雷石榆那樣，力爭省內外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團結，堅持深入民眾，為民眾寫作的文學路線，堅持將台灣文學重建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思想，是一九四六年到四九年這一場論爭的共識。本省作家楊遠、賴明弘、林曙光，省外作家羅鐵鷹、雷石榆、孫達人等人（加上美術界的黃榮燦），共同建設了一個省內外知識分子共同追求民族團結、和平與進步的論壇。這個珍貴的論壇，雖不幸在以四九年「四·六」事件為起點的白色恐怖中破壞，但今天主流思想宣稱光復後台灣知識和文化界中，省外與省內形成「官方」與「民間」的矛盾衝突，是沒有事實根據

的。

和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和藍明谷相較，吳濁流的存在就較為特殊。他在光復前日據期嚴苛的政治下，冒著危險寫下了名作《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在光復後，也寫了批評戰後國民黨不良政治的《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是台灣新文學的「光復前後史」中絕不可忽視的作家。有趣的是，藍博洲細緻深入的調查卻告訴我們，這位具有強烈反日愛國思想，敢於冒死寫長篇抗日作品，勇於在二·二八事變後的非理中發言的吳濁流的另一個身影，日據下則安居偏遠寒村中的小學，過著自我隱遁的、「無聊、寂寞、憂悵」的年月，自覺地離開抗日文化運動，滿足於「平凡的幸福」。藍博洲沒有告訴我們戰後迄四六事件到白色恐怖時期，再到《胡志明》中譯出版前的吳濁流的「身影」，留下了耐人尋思的空間。

藍博洲為我們再現了簡國賢、呂赫若和藍明谷在面對死亡前高潔的人性品質，使人們對於他們英年殞折，感到加倍的痛惜。但懷抱壯志東渡大陸的、重要的台灣大眾語的文學家宋非我徘徊逡巡兩岸三地的崎嶇、寂寞的一生，也引人傷悲。被迫分離半生而猶鶼鶼情深，至死不渝的雷石榆和蔡瑞月半世生離，引人三歎。而這一切令人顫慄的悲劇中人，正是中國當代歷史上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雙重結構下陰暗、暴戾的權力的犧牲者。而在這陰暗、暴戾的權力統治下，民眾受害歷史被長期以抹殺、謠言、醜詆和謊言長期湮滅、沉冤不雪。

權力總是千方百計地要湮滅它加害於民眾的慘絕的罪行史。民眾的歷史，包括他們勝利、挫折和被害的歷史，只有透過民眾自身的調查、研究、揭發和控訴，方能把被封禁的歷史解放出來，把被顛倒的歷史再次顛倒過來。而藍博洲從八〇年代中期以來長期的、民眾史的傑出調

查、研究和報告，為台灣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民眾嚴重被害歷史真相之揭發和控訴的事業，以他卓絕的勞動，科學的調查研究，鉅細不遺的查證，做出了動人而厚重的成績，感人至深。

然而，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和「民主化」，並沒有祛除冷戰與內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邪魔，甚至使它變本加厲地遊蕩在這受祟的島上。藍博洲的調查和報告，依然為當前主流思想所嫌忌。以藍博洲為代表的台灣民眾史的鬥爭仍未止息。但越來越廣泛的民眾和讀者對藍博洲調查報告系列的支持，讓我們預見了民眾史的事業的勝利。是喜以為序。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八日

尋找台灣新劇運動的旗手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



作家身影

宋非我

宋非我是抱著落葉歸根的心情回來的！可迎接他的卻是官方的拒絕，以及故里民眾的冷漠！事實上，除了少數老一輩外，又有多少人會知道宋非我這個曾經引領台灣劇運風騷的人物呢？在故里社子一帶的後生晚輩看來，他不過是個落魄潦倒的孤單老人罷了！

一、走入歷史的迷霧

第一次聽到「宋非我」這個名字，是一九八七年四月的事了。那時候，退伍不到一年的我剛剛到現在已經休刊的《人間》雜誌工作。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關「二二八」的田野調查與寫作。那時候，解嚴前夕的台灣，有關「二二八」的話題仍然充滿著禁忌；書市上也看不到什麼公開擺設的、有關「二二八」的著作。那時候，我對「二二八」的理解主要還是通過閱讀吳濁流先生的《無花果》，然後就從台北大稻埕的歷史現場出發，一路南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田野採訪；可這段時日的訪談卻因為諸多條件的限制而未能進入事件的核心。因此，稿子雖然寫了，不久便被退回來。

歷史的禁忌，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讓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題目，改作其他主題的報導。可當時《人間》總編陳映真先生卻鼓勵我繼續作下去！這樣，我只好回到在採訪過程中新近蒐羅的文字資料中，尋找線索。後來，有個服預官役的朋友休假時帶了一本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的《「二二八事件」真相》小冊子出來；我很快地閱讀了署名謝阿水的這本小冊子，並且注意到裡頭所寫的一個台大學生「吳裕德」。



二二八事件的現場之一。

台大學生吳裕德

這本小冊子先後兩次提到吳裕德這個人。

首先，在第五十五頁至五十六頁，謝阿水寫道：「在查緝私菸引起的騷亂平息後，未及四小時，即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為維持治安，發表『台北市區宣布臨時戒嚴』公報，中共『台省工委會』分子台灣大學學生吳裕德所領導的暴徒數千人，以完全失去理性的手段，搗毀了延平北路的警察派出所，台北市區的暴動，終於不能遏止。『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第二天，「終宵擾攘不安的台北市，經過清晨短暫的平靜後，上午九時，由台灣大學學生吳裕德率領的一群暴徒，敲鑼打鼓，強迫商民罷市，並蠱惑沿途民眾，參加他們的行列，於是尾隨人數愈來愈多，形勢漸至不可控制……」

另外，在第六十四頁，謝阿水再次提到台大學生吳裕德這個人。據謝的敘述，吳裕德在三月五日「召集台灣大學、延平學院、師範學院等校學生數百人開會，聲言推翻現時政府，並決議集體簽名參加共產黨」。

謝阿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在暴亂的社會條件業已成熟，再經共產黨加以「攪和」而爆發；「事件」之所以迅速擴大，當然更與共產黨的「煽動」有關……

如果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麼，具有中共黨員身分的台大學生吳裕德，就該是影響整個事件發展的關鍵人物了。當時，我是這樣判斷的。於是，我隨即騎著機車到北投請教一位幾年前才從火燒島回來的老政治犯。